

一部不可多得的当代长篇巨著

——曾庆仁长篇小说《虚度一生》研讨会发言摘录

潘年英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曾庆仁的长篇小说《虚度一生》,潜心构思30多年,深刻反映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新,作品风格鲜明独特,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

[关键词]曾庆仁;《虚度一生》;独创性作品;精神深度;形式探索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5-0024-08

A Rare Contemporary Long Novel

——Speech Excerpt at the Symposium on Zeng Qingren's Long Novel *Idling Away His Life*

PAN Nian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Zeng Qingren's long novel *Idling Away His Life*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mental state of current intellectuals. Zeng spent more than 30 years on this novel and made bold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its structure narrative language. The novel is distinct and unique in its style and it is regarded to be a works that is hard to come b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Zeng Qingren; *Idling Away His Life*; original works; depth of the spirit; exploration of the form

潘年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各位,今天的天气不错,我看大家的心情也很不错。今天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想讨论一下曾庆仁先生的作品《虚度一生》。这部书稿曾老师很早以前就跟我谈过,当时他和我讲,他有那么一部书,书名就叫《虚度一生》,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书名就非常的激动,我说这个书名太好了。但曾兄说,那这个版权是我的,你可不能去搞啊,我说那当然。我当时真的很激动,现在也还激动。但当时的激动和现在的激动还不一样。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想的很多,也很好,但做起来很难,很多构思很好的作品最后都不一定写得出来。有好几次我跟曾老师说到我的几个作品的构思,他觉得很精彩,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是拿不出作品来。所以当初他跟我说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的兴奋是停留在作品构思的意义上的,是一种抽象的激动,而今天当我看

到这个作品的真实面目的时候,我就有了更加全面的把握和更加感性的认识,因此今天的激动和原来的激动是大不一样的。他当时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没有想到它会那么有意思。后来他在打印这个稿子的过程发了一份电子版给我看,刚读了个开头,我就已经很震撼了。后来在我主持的《杉乡文学》杂志给他连载了前面的两部分,这两期杂志印出来后,很多人都看到了曾兄的这部作品,不少朋友跟我索要刊物,说就是因为想看曾庆仁先生的《虚度一生》。于是,我知道,一部经典就这么诞生了。后来他把全部书稿完整地打印出来,送了我一本,我一看,就更加震撼了。曾兄说,这本书打算写3部,目前只写出来两部。第1部主要是由5个自序和一个副本组成,第2部则由25篇不同样式的文本组成,其结构本身就非常的独特。整部作品就好像没有正文,但其实都

收稿日期:2013-04-28

作者简介:潘年英(1963-),男(侗族),贵州天柱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是正文。“虚度一生”，我觉得这个词太能概括我们当下这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了，这也是作者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这个概括太精炼了，所以当初我一听他说到这个书名，我就兴奋得不得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不是虚度一生？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个更精炼更准确的词来概括我们今天的精神状态了。在如今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虚度又还能干什么？虚度，那是必然的，是命中注定的，就像人注定会孤独一样，虚度也是我们摆脱不了的宿命。但在虚度中，我们也注定不会无所思索。所以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我都觉得非常精彩。

这本书的语言我觉得也是非常独特的，它跟我所见到的任何文学作品的语言都不一样。我曾经说过，曾庆仁总是像写诗一样写小说，又像写警句一样写诗。那么具体到这本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本书的每一个句子都是诗句。我对一个作品的评价是有一些标准的，语言的独特和典雅就是标准之一。有些人就总爱问我，说潘老师你对这部作品评价那么高，你有什么尺度和标准吗？我说那我有我的尺度和标准。首先我认为一个文学作品，你写出来以后，得看你对文学的贡献是什么？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和尺度。因为我们今天的很多写作是重复别人的写作，人家已经有了一个东西，然后你依然画葫芦写一个类似的东西。你的东西可能写得不差，但是对于文学史或是文学本身的意义那是要大打折扣的。不久前我还跟曾老师探讨过文学写作的重复和创新问题。比如当年的伤痕文学，我们都知道这个流派的命名来源于当时复旦大学的一个叫卢新华的学生写的一个小说《伤痕》。在那个年代，能第一个揭示出时代的“伤痕”，那还是相当了不起的。但那之后却有大量类似的作品出现，那些作品的价值就很可疑了。今天我们所谓的“新写实”也好，“晚生代”也好，都是这样，重复的写作太多。那天我还讲了一个问题，你看当今那些主流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作品，第一句话，你注意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都是“张三在干什么什么的时候，李四正在怎么怎么”，反正都是这样一种句式结构。就跟当年莫言他们模仿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种语式是一样的。“若干年以后，怎么怎么……”，似乎小说不这样写就赶不上时代。山西有个作家叫李锐，李锐他写过一部作品叫《银城故事》，很多评论家和小说家同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都相当高，李锐自己也比较满意这部作品。但在一篇类似创作谈的文章中，李锐谈到了他很后悔这部作品的开头，使用的正是当时被大家用得烂的马尔克斯式的句式。他说其实他也不想刻意去模仿

马尔克斯，但就是摆脱不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当时刚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以当时写作《银城故事》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马氏语言的影响。李锐说他其实很想摆脱这种影响，但就是摆脱不了。在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中国作家都在受到马氏语言的影响，因此真正有独立创造的人真的太少了，屈指可数。所以我一看到曾庆仁先生的这个作品的第一句话，我就很震撼，因为这是完全陌生的一种语言形式。

除此之外，这本书在形式上也做了很多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你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见不到的。比如这里有些段落，是由很长的对话来结构的，还有些则完全是诗歌和格言。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曾庆仁先生的这种探索并不是为了刻意的标新立异，即不是为了探索而探索，而是一种很自觉同时又很自然的写作。事实上，曾兄的写作一直都是这样的，这几乎形成了他个人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就是精辟，同时精彩。现在的很多作品我们是翻过去的，可以一目十行，但是曾老师这本书是不能快读的，他的每一句都写得极其精辟和精彩，读每一句都值得你停下来思考好一阵子。当然，这里的思考并不玄奥。就是我看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非常明白的，同时也是很精彩的，既看得明白，又值得思考。这就是说，这部作品的写作是很有深度的。深度，是我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第二个标尺。有些作家为了追求所谓的深度，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其实真正有深度的写作并不玄虚，曾兄的这部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总之，这部作品结构精巧，形式独特，内涵深厚，气象宏大，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一部经典。但是我们都明白，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堪的时代，这样的一部经典又注定会被严重的边缘化。我曾经和曾庆仁先生谈到过这部作品的命运，我们都设想这部作品的读者接受过程可能会非常的漫长，长到可能我们都看不到那一天的到来。为此，我们感到十分的悲哀，当然同时也感到庆幸。悲哀的是很多读者可能因此错过了见识这部巨著的机会，庆幸的是它毕竟已经诞生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作品注定要被边缘化呢？或者说注定不可能受到大众的重视呢？这里的原因很多。简单来讲有两条，第一是跟曾老师的生活态度有关。那即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追求自我边缘化的人。要知道，曾庆仁先生在诗歌写作方面，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那时候他几乎在国内所有的权威诗刊都发表过作品，因而在诗歌界获得了相当良好的声誉。但自90年代以后，他不再参加任何文学活动，也不再发表作品，基本上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

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众所周知,今天所谓的主流文学杂志实际上已经被那个意识形态绑架了,文学也越来越圈子化和市场化了,所以我们现在进入那里面实际上也是很难的。换句话说,边缘化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可喜的是这部作品已经面世,我觉得我们对它首先应该表示一种最基本的敬重态度,然后才想到要进一步让那些真正爱好文学的人们来共同分享。所以我一直在极力地推荐它、介绍它。我记得郁达夫曾经评价鲁迅时这么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我觉得用这个评价来评价曾庆仁先生和他的作品,也是同样适合和恰当的。我觉得《虚度一生》这个小说无疑是今天最好的文学作品之一,所以今天我特意把大家都召集过来,让大家一起来赏析这个作品。大家能如约前来,我感到很欣慰。好了,我先简单的说那么几句,期待能抛砖引玉。

郑长天(湘潭大学文学院博士、副教授):我谈下感想,没有系统的准备。老曾的这个东西不好评论,所以我只是谈谈感想。看了老曾这个东西,我感觉不容易看懂。我当初拿到一本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进入了。但是昨天晚上因为要参加这个座谈会所以我再读了一遍,但是感觉不容易读懂,我一下子就打瞌睡了。所以说读这个作品是需要机缘的,它并不是随时随地就能让你进入的。昨晚我开始想我谈什么话题,我说这个作品晦涩吧,它也不能算是晦涩,但也不好说。从老曾你这里来说呢,主要就是你的精神深度,让人不容易进入。第二个是你的表现方式,通常文学是把一个感性的生活实践表现出来,而老曾是把这个表象化的生活实践给遮蔽起来了。为什么那天我看了就懂了呢,而昨天我看了就打瞌睡?其实和我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有关系。当时我能够从你这种表面上冷峻疏离的文字,感觉到它们背后那个感性的世界,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所以,一下被打动了。所以要打动人作品里面还是要有感性的东西,老曾的作品里面事实上隐藏着这种东西。昨天我就没有进入这个状态。就是说,进去是有难度的。但是一旦进入,就会被它打动。说“打动”还太简单了,应该说是“震动”。第一个晚上我一下子就进入了,状态很好。当时我就和老曾说过,好像很久以来我都在等待这样一种阅读,真的是这种感觉。那么我就说我那天晚上的状态和昨晚的状态就是那种局内和局外的状态。这个东西是写给局内人看的。这个局内人

是指更适合那样一种创作的,充满诗性的那种创作的,是指生命中有着诗性的那种人。这是一种真诚的状态,不是说什么体制内的作家会员之类,不是那个意思。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么一个世界不容易进入,但是你一旦进入之后,那些语言和丰富的情感,那些感性的系统,那些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生态,一下子就呈现了。我自己有了这样的阅读经历,而且它特别能打动人。

老曾的作品中的这个世界,按老曾的写作方式,看起来好像难懂。后来我的感受是,这是一种对抗的方式。以往的写作方式是带有包装性质的,而老曾的这种表述,是直接进行的一种赤裸裸的精神表达。就因为太赤裸裸了,完全违背我们的阅读习惯,没有任何的叙事之类让你缓冲情绪和思维。我们长期浸泡在那种惯性里,突然看见这种真诚的方式就一下子极不适应,晃眼,眼睛睁不开。因为我们的思维和感觉在那样一种惯性的阅读里面已经被模式化了。就是说,当你突然面对这样一种很真实的话语很个人的话语时,你突然感觉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去阅读。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就是有多多个“我”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浮躁、无聊的“我”,但是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个真实的“我”会出现。所以我在“那一刻”就完全能够读得进去,不在“那一刻”就读不进去。所以我觉得老曾这个作品是给“局内人”看的,而且“局内人”也并不是经常有“局内”的状态,所以,不指望他被更多的人接受。但是你的这个作品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作品,研究起来会有难度,争议肯定也会非常多。我在看了之后就在想该怎么评论,实在不好评论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我接受模式化的东西太多了,不能一下子融入到那里面去。

在写作上,老曾是个走极端的人,就是说,作为一个创造者,他心里面的种种倾向,他都要把它探究到一个极端;然后他要找到一个表达的倾向,然而又会存在着在各种倾向的表达之间的交叉迂回。这里面有他生存状态中的神圣的与世俗的内容,纯粹的诗性里又有种复杂性。这个东西可能平时出现在我们的感觉上面然后就过去了,不会去深究。但是可能是老曾你的当乒乓球运动员的经历,这个球要怎么发,是吧,它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办法。有时候我们是比较模糊的,就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而在你那里就一直穷究,穷究,这个球要怎么发,穷究到最后。可能就是你这穷究的态度,穷究的习惯,最后就导致了你的表述是非常精妙的,复杂的。

赵旭如(诗人):我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以前从不参加什么研讨会,我是一个不靠谱

的人。我和老曾好几年前就见过。去年和郑长天一起和老曾又见了一面，拿到他的诗集，当时对老曾的认识还不够，回去读了之后，觉得非常好，向一些朋友作了推荐，他的东西让我得到一种审美上的体验。我喜欢听歌，什么流行音乐都听，摇滚也好，民谣也好，张学友、刘德华的也好，都听。但是到了40岁以后，我开始发现那些东西不给力了。我一直在找合适在车上放的音乐，现在开始在车上听一些我以前不怎么喜欢的，比较严肃的音乐，小提琴啊，钢琴啊，交响乐之类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当他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慢慢平息后，就会慢慢地感到，真正给力的还是那些大师的东西。我以前对交响乐是不怎么喜欢的，因为觉得太高雅了，太殿堂了。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是在下面睡觉的。但是记得有一次我回湘大，那时我还在湘大读书，1990年，因为搞学潮的事吧，我得到通知湘大要开除我，那时我已经在家里住了一阵子了，回去是收拾行李。晚上，回到寝室里。学校里的男生寝室，晚上那种气氛你们是知道的，开着灯，有点凌乱，有些同学上自习去了，有的在寝室里玩，或者看书。我一个人回到寝室，那种心情下，突然就听到一个收音机里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觉得当时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给击中了，那是很特殊的时刻。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不喜欢那种音乐，但是在那种时候，只有那种东西能把他击中。所以我觉得老曾的东西如果要用音乐来比喻的话，有点像严肃的交响乐。我写诗读诗20多年，经历了很多过程，最初都是很纯粹的，后来在形式上也做过很多尝试，口语化啊什么的。现在看老曾的诗，他的诗形式比较一致，没有太多意象化的东西，他都是很抽象的，直指人心。我觉得达到一定程度，还只有这种东西才给力。我现在比较接受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不怀疑他的深度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呢，刚才在来湘潭的路上和孟老师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化的问题。现在很多东西都和媒体、商业挂钩。任何一个人出一本书，都是被人推出来的。现在出来的书都有一个封带，上面有一些人对他的评价啊什么的。不管是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背后都感觉有人在炒作。要在这样的时代保持相对独立，像老曾这样一个作家，这样一个作品，很少见。这十多年来，我看了太多那种畅销的和被推销、被炒作的东西之后，现在我觉得我看到那样的东西会很烦。包括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写手，专栏作家，他们是名利双收的。他们的文字也确实很漂亮，但是容我说句有点偏激的话，只要是在媒体写过的，他们写的东西就与真正的文学距离很远。我自己也写过专栏。媒体写作是一种什么

东西呢，它就是要先考虑受众，它是有目的的，是功利的。我曾跟一个朋友说我们要“去媒体化”，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个朋友说这个词早就出现了。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在商业炒作，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接触老曾的东西，会很喜欢这种气味，觉得很亲近？因为他是和这个时代对峙，独立于时代的，对于时代，他是努力保持某种清醒的。

第三个我觉得我之所以喜欢老曾的东西，与我上个世纪80年代在湘大读书，当初那种写诗的经历有关，当然也与湘潭这个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开始写诗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理想的时代，是我们最好的青春时光。我当时开始写作，开始阅读，我们迷恋一种气息，一种气味。后来我们离开了，后来越走越远，后来到了40多岁的时候，回过头看，发现老曾的东西还依然在那里，依然保持着当年我在湘大读书时所喜欢过的那种气息和味道，那是一种很纯粹的东西，一种精神气质。我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喜欢。

张德宁（作家）：庆仁的这本书终于出来了，这本书的写作，应该酝酿了20多年吧。从他的《自序》里边可以看到是从30岁开始，对吧，一直写到50多岁，现在终于拿了出来，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第一部第二部还有第三部。现在出来的是第一部和第二部，一共60多万字，如果还有第三部的话，那至少是90万字了，应该是一部宏篇巨著了。第一、二部一共700多页，一般的人要是能把这本书给读完，很难。一般的人要通篇看完《红楼梦》，都有一定困难，那么多人说读过《红楼梦》，真的通读过吗，我怀疑。庆仁这本书是一本难啃的书。近年我国对这种难读的书越来越重视，当年萧乾和文洁若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他们伉俪翻译了4年。另一位译者金隄教授，坚持数十年研究《尤利西斯》，倾注了毕生心血。但是现在从网上来看，它已经有了10多个翻译版本了。萧乾当时还比较悲观，中国的社会现实还不允许作家做这样的冒险，作这样的牺牲，也没有作家敢冒这个险，写这样的作品确实是一件冒险的事。乔伊斯的另一本更难啃的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全译本，但已有人专门研究。尤其是两年前美国作家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全译本的发行，标志着我国翻译界乃至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确实是令人振奋的大事。就像刚才有同志说的，当今社会已媒体化，人跟着媒体走，尽管很多小说已经通俗化，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在关注这样的尖端作品，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作品，这个小众虽小，但立场坚定，全身心投入。

文学作品,我觉得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让人铭记和遵循的,如《圣经》《古兰经》这一类的书,并不难读,它的目的是让人铭记,而且要作为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这种书可以流传几千年。另一类书便是通俗类、娱乐类,纯文学也可以包括在这里面,大部分的书都是这一类。纯文学既有可读性,也有人研究。通俗类也有人研究,比如说金庸,甚至有北大的教授研究金庸,但几十年以后还有没有人研究金庸,很难说。另一部分书,就是没有多少读者,很长时间还有人研究的书,如《尤利西斯》,1921年发表的,90多年了,国内国外一直有人研究,而且还会继续研究下去。《芬尼根的守灵》1939年出版的,到现在也70多年,国外就不说了,中国现在有人终身研究它,也有人准备把它翻译出来。乔伊斯吹牛皮说《尤利西斯》要养活几千个教授,《芬尼根的守灵》要让评论家忙活300年。不知道这是他的狂言还是现实,至少《尤利西斯》养活几千个教授这句话还是成了现实。爱尔兰首都柏林有一个纪念乔伊斯的节日——“布卢姆日”,爱尔兰政府把《尤利西斯》中的一个主人公定为了节日的名称,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研究学者到了那一天都去,可见国家的重视。一个国家用节日的形式纪念一个作家,这是很难的。我们还没有把《红楼梦》,或者曹雪芹当作一个节日,或者重大的持续的文化活动,我们现在炒作《红楼梦》大多还是从商业价值来考虑的,比如建造大观园,多次重拍电视剧等等,虽然有些文化因素,主要还是从商业利益考虑的。爱尔兰对乔伊斯是从文化的角度加以重视的,很了不起。所以第三类书就是让人研究的书,我估计庆仁的书也就是这样一本让人研究的书,这肯定不是一本让人有阅读快感,阅读起来感觉很顺畅的书。容格说他看《尤利西斯》看了3年,看不懂它写了什么东西。庆仁的书绝对是一本这样的书,可能会有人研究,但估计没有多少读者,而且研究的人也是极小的一个范围里面进行的。从文学史这么一路看过来,我估计会是这样一个状况。

庆仁的这本书我现在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已经读了一部分。原来庆仁已经把一部分,几个章节或是几篇或是几个片断给我看过,集合起来也有几十万字了。从整体上看和原来看的感觉不一样,我原来和庆仁说过,要出书,一本一本本地出,诗歌类、小说类、随笔类这样的集子,当时他不置一词,现在看起来他还真是一个高明的做法。他把这些类别全部集合在一起,他这两部书里有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四个大类,他全部融注入在他这两本著作当中了,表面看好像没有经过精心的结构和剪裁,四个文类全部混合在一起,

而且他全部把它拆开,小说类的没有归类,那些随笔那些格言式的哲理式的小品也没有归类,戏剧类的也没有归类,全部是散见于整个作品里面,一般人不会这么做的,一般人都按习惯,就是小说类、散文类、诗歌类、戏剧类,这样分门别类做成集子,线条清晰,但是容量不大,庆仁的高明就在于把它们全部融铸在一起,融在一起,容量就大了,力量也大了,制造了一种新的类型。这本书是各种文体的混合、各类文章的拼贴,符合这两个特点的话,我认为它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著作。说它是小说,还有点牵强,说它是文学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在文学史上应该有先例。就现在的目力所及,国内的作家还没有人这么干过,但是一些国外的大师就是这么干的。《尤利西斯》就是这么干的,《芬尼根的守灵》就是这么干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是这么干的。有人研究,《芬尼根的守灵》整个的单词是6万多,乔伊斯自己就创造了3万多个单词,这样的书谁能够读懂啊,连单词都读不懂了,乔伊斯故意这么干,不懂才会去研究,一个明白如话的东西谁去研究?乔伊斯做了一个大迷宫。庆仁的这两本书也是做迷宫,当然做迷宫不是庆仁先做,博尔赫斯这么做过,卡尔维诺也这么做过,所以并不一定说是创新,庆仁还是努力去做了,对于庆仁来说,这就是探险。一般来说写小说还是让大家都看得懂,作家写书不是让人看不懂,他要将他写的东西明白如话的让人知道,大部分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庆仁的作品就像探洞,洞里有什么呢,有河流有陷坑,有暗道,可能会陷进去,有生命危险。就是因为危险,使人产生了无穷的好奇。攀岩也一样,无限风光在险峰,危险与惊奇同在,这就是勇敢者的游戏。

庆仁作品的特点,可以说是将他的思维和才能都发挥到了极致,作品里面一些闪光的片段很能体现作者天才的素质。比如讲有一个章节就两个字“事实”,简单地讲,像中学生一样是用“事实”造句,创造一些哲理性的句子,他一口气下来,造了八百零几个。没有才能的话,一般人是创造不出来的,这不是一般的脑袋可以想出来的。这样精彩的断片不只是一部分,而是有很多个部分,散见于全部作品当中,包括他的哲理小品。比如说像卡尔维诺式的,一两千字的东西,很有寓意,这些东西也不少,很多哲理也融注在议论性的文章里面,诗句里面,天才的闪光都融注在这些文字里头。当然,他确实有思维定势、语言定式,有同志也指出来了,比如“比黑更黑”,“比白更白”,“在南方的南方”,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不少,这些句子既有新意,同时还值得商榷,从逻辑方面来推敲的话,他的有些句子是推敲不通的,从现代汉语角度来推敲的话,他

的有些句子还是病句。他为什么这么做？从正面意义来分析，能明显看得出他这是对语言的有意解构、故意破坏。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用一百个字母，创造了一个单词“雷电”，而且反复使用了十遍，每用一次，代表一种寓意，从人类产生开始，是人类对雷电产生的恐惧，而对神灵产生了敬畏，使用“雷电”的作用就在这儿。乔伊斯故意对固有的思维和语言进行破坏，从而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庆仁估计也是这么干的，但是成功与否，那是另外一件事。他的不少句子确实不合乎逻辑，不少精彩的句子确实更是不合逻辑的。如用“事实”造的那些哲理句子，有些句子读不通，但又能看出它的精彩，这种效果就超出了习惯思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庆仁故意这么干，破坏的结果怎样，可能破坏了他自己的形象，也可能破坏了书的整体，这毕竟是一个探险，一种探索，结果如何，值得大家研究。我的感觉暂时是这样，现在还没有看完，还谈不上全面分析，仅是初步的印象而已，他的主体思想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本书等等，还要细读，细细品味，刚才竹青先生也说到，我不多说了。我的评价：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但是还有瑕疵。这是我目前对他的一个基本评价，但还是贴标签式的评价，真正的评价还有待来日。

孟 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我就说两句话：我们老曾干了些什么，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老曾为什么这么干？至于干了些什么刚刚其他老师都说了，我基本上没什么异议。我想补充的一个意思就是老曾为什么这么干？我跟老曾、老潘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可以说是同一个年代，我觉得老曾写出这个作品来，从我个人经历体验来说，可以补充一个解释，这个作品创作方式的途径。就是我们这代人对文革略有所知，老曾知道的比我们多一点，因为他比我们大一点，教育定格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有一点小“五四”的感觉，我在读老曾的作品时，我觉得“于心有戚戚焉”。一种什么样的戚戚焉呢？我甚至觉得老曾的文学抱负志向实际上是不能用文学来界定的，是文学以外的抱负。老曾说他自己本来想写三个东西，一个叫《虚度一生》，一个叫做《站在时代之外》，一个是《一个人的价值世界》。看了这个我更加相信我的感觉，就是老曾的这个努力，他是想靠着一个人的努力站在时代之外扩张一个价值世界。对于汉语言文化传统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世界。他在某种意义上自己也很明白“我”这个书是个失败的书，各种各样的表述都说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书对于他来讲好与不好已经不重要，这也更加坚定我认为老曾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堂吉珂德式的，我这个

没有贬义或讽刺的意思。在我们这个精神传统里面，这种姿态和勇气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你能进入他的梦想中间里面去，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他的书我是非常耐心硬着头皮读下去的，说实在的这个方面我也是外行的，特别是不能像作家那样对小说做出个专业的认知。但是确实这个作为个小说或者是诗歌文本或者哲学随笔的文本，用任何一种方式鉴定都会有一种破坏性。他这种建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我觉得刚说到的80年代的教养有关系。所以我能感觉到《虚度一生》里面很古典的那种精神状态，同时也能感觉到那种现代主义的精神状态。同时，它所能表达的形式上又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它每时每刻都在捣毁、拆毁自己想要建立的这种东西，它事实上对这种传统意识、综合意识、这种士大夫文人意识的精神状态是质疑的，而且深入到骨髓里了。自己编织一个东西时，他就要拆掉一个东西。我能看清这种现代主义精神的古典气质，而这种古典性质的东西就是英雄主义的东西，和那种血色一样的东西。

杨 曦(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尽管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指向人的内在灵魂，但大体说来，作家往往有两个视野，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对内就是探究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对外就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与此相对应，文学作品中就有内外两个现实图景，一个是外部世界的真实，一个是内心世界的真实。中国文学历来重视对现实生活的描摹，注重反映现实世界澜壮阔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文以载道”的传统。而在西方，更注重对人内在灵魂的探究，尤其到了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已不再是对生活和现实的某种本质的反映，它更多的是小说家的想像和虚构，小说的真实就意味着是小说家人为的想像，是现实在小说家心理上投映的真实。读诗人曾庆仁的小说，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品中的现代意味浓烈，其篇章结构，他很多的写作技法，甚至他的思维方式，都有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很注重对文学终极之美的追求，注重捕捉和再现内心世界的真实，注重用高贵的理性去观照灵魂里的挣扎和搏斗，更注重书写现实的荒诞在人内心深处留下的伤痛和撕裂，这一点跟《野草》很相似。诗人不断追求独立不羁的个体生命价值，并从中生出天马行空的灵魂来。精神世界的深广让他的小说充满着内在的激情，凭借着非凡的艺术想象，从空白处说出第一个字，从虚空中凭空创造出一个新作品的野心贯穿在他作品的始终。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作品，这种有野心的作品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感到新奇和兴奋，同时，写作这样一种“无中生有”的作

品,也确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量。而另一方面,诗人对现实的思考,对世俗生活的反叛,都基于他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诗人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也非常中国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仿佛是先天的遗传,因此他作品中又自然而然地蕴涵着东方人所特有的节制和隐忍,这种东方艺术家特有的节制和隐忍让他的文字显得含蓄、醇厚和雅致。因此,曾老师的作品,就像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棵奇异的植物,它是东西方不同异质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它神奇独特,沉郁顿挫,但又肆意横生,充满勃勃生机,由此我们可以说,《虚度一生》这部作品,或许它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传统。

田耳(作家):今天我来到这里感到惶恐,并不是讲套话,我不是谦虚的人,以前碰到的发言也说惶恐之类的开场白,但这一次真的很有压力。前天就跟田茂军教授推辞,但田教授强大的人格魅力又不容我跟他讲个不字,硬着头皮就来了。去年沈从文研讨会时,见了潘年英教授一面,当时他推荐《虚度一生》要我看,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一是想这大概是客套话,就像大伙见面留手机号,后面99%不会拨。二是对自己的阅读能力较为自信,这十几年,除了读就是写,不干别的事情,也算浸淫于小说之道。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反过来,我坚信写作也是阅读能力的一道注解。潘年英教授鼎力推荐,我也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今年元月,田茂军教授真就将厚厚的两册《虚度一生》送到凤凰,拿着沉甸甸的书,看着扉页的题字,我就意识到我碰上认真的人,不是一位,而是三位。抚摸着书还兴奋,回家就看,但看了几页就傻了眼。潘教授是以小说推荐给我,但我看了很多页,没有发现小说的踪迹。过几日和爱民兄碰面,他问我看了多少,我顺口说一百多页,其实读到70页《整个下午在阳光中等待一个人》之前。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读了70页后我确认这不是一部小说。我判断的标准是结构,我的先验意识是长篇小说可以跨文体,可以面目新异,但内在的结构必须要有,这样我才可穿过纷繁的文字寻找到往下走的路径。其实我是极喜欢阅读独特的小说,这些年重点阅读三大群体:一个绕不开的是拉美“文学爆炸”潮流中的几个主要成员;一个是法国新小说派;还有一个是乌力波,也就是主体在法国的“潜在文学工场”,但其最著名的成员却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因为阅读范围的原因,我试图拿《虚度一生》跟我读过的小说找对应,确实对应不上,以上小说派别,不管手法如何变换,长篇的结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可以说法国人的结构能力领先于世界,他们的长篇创作才成为世界性的高标。具有突破意义的长篇小说家,往往痴迷与小说

结构,钻进去就出不来。以上对应不上,我又想起看过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身边》,《追忆似水年华》7卷,我只读了这一卷,虽然它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叙述时常跳跃和闪回,但看得出它的叙述还是依着时序,得处理贯穿其中的时间轴,其实,时序也是最基本、最开放的结构类型。

既然《虚度一生》找不出结构,我就在想它到底应归入哪一类?你可以空泛地说一句跨文体,但跨了之后,还是必须靠在某一支上,这部长达60万字的著作,它虽然囊括文学领域各种形式,但可以对其的主体作出判断。就我阅读的这一部分,得来窥豹一斑的见解,它大概更接近于思辨性散文或者随想录。当然,我没读完,这是对前面70页作的一个判断。作这些基本判断,是我阅读的一种惯性使然。对前面这部分的阅读,我的目光是跟语言走的,绵密,人不难顺着走,但读了以后脑袋里只有一些碎片似的印象,形成不了整体。正因为没法整体把握,我不知道读70页和再读200页区别在哪里。说穿了,我还没进入这部作品的气场。要讲客套话,我会归咎于自己的年龄,可能还没到阅读这部作品的时机,但曾听李敬泽先生说过,一部拿到手的书,一年内没读,永远也不会读。我深以为然。是否再读这部作品,我没有把握,这年月,可读的书实在太多,读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说没有把握,是对于此书的尊敬,因为我还是相信机缘,这部作品需要读者带有皈依之心去读。这本书要寻找的不是一般读者,而是能进入独特气场的知音。有人表示现在没读懂,以后会读,其实大都不可能再读,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这部作品本身对读者拒绝的气质所决定。我读了70页,打动我的却是曾庆仁先生的创作态度,这种自信和决绝,这种吾将高驰而不返,这种开疆拓土寻找新大陆自信与勇气,是种对文学皈依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他那里持续了30年,早已形成惯性,以后势必持续一生。皈依是件很难发生的事,特别在我们这种以怀疑为成熟土壤里。而且,能把文学作为信仰加以皈依,差不多是在最不宜的时候做最不可能的事,但曾庆仁先生这么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虚度一生》的“虚度”,其实就是和世俗生活方式加以区分,“虚度一生”也就是“皈依一生”。这种状态正是我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状态,这种写作是天才式的写作,自信满满,不容怀疑。在文中很多地方可看出来,曾庆仁先生对此是深有体悟的,若没有这种体悟,如此庞大的作品将失去写作动力。当初开始写小说,我也很想找到小说自我开始的状态,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但根本不具有那种勇气,稍微写了几年,就开始摸索写作规律,期刊风格,摸索出来,

想的就是依照规律尽量比别人做得更好。比如写长篇，一直在写，一直感觉无从下手，很多人也劝我你只能写中短，写长篇不是料，我不信这个邪，继续摸索通行的途径，要摸透它，摸透了就要比别人更下力气去贯彻执行。我定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有长篇发到公认有判断力的文学杂志上，发得上去，证明我能写，证明这点以后，再想下一步怎么走。我的目标全是实打实摆在那里，具体，可操作。曾庆仁先生的创作方式，是我们曾经有过，稍一碰壁就丢弃的方式，正因为众多的人退却，他的留守才具有标志性意义，才让人看出皈依力量之存在。来这开讨论会之前，我上了网百度别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也上了潘年英先生的博客，看了他对这个作品的极力推荐，但所有的评论，大都只谈作品的语言，没有涉及文本结构和思想理路，可见其文本实是难以进入。看来看去，很多人说到成功与失败，但在我看来，评判这个作品恰不必从这个层面进入。因为我知道，这种写法是所有写作中成品率最低的，这种作品几乎不可能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像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意义，你也不能用成功或失败的定义去定义它。我打个比方，好比玩标靶，我这种常规的创作，靶心只10米远，我投了无数只飞镖，偶尔碰到个七八环；而曾庆仁先生预先就把靶心推至无限远，并藏在一片黑暗当中，你根本看不见。要论成功，就如同你往黑暗中投标，且认定九环都不予考虑，十环才是目标，还要一标中靶，那你可以想象，他命中的机率会是多少？当然，相对于注定成功的事，有些人就愿意去干极有可能失败的事。我们现在说到创作，基本是依照传播学上的意义探讨成功失败，而有些人，他们脱离了这个普遍判断，他们的成功就是留守不退却。说到天才式的创作，我想起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朱苏进曾经着力研究过“天才”问题，他认为，天才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天才本身即意味着异端，被践踏，被埋没。天才并不是没有，但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夭折，偶尔有一两个冲破重重阻碍冒出来，才显得光芒万丈。世人不识凌云木，直到凌云始道高，世俗就是这样。朱苏进研究透这个问题后，不写探索性小说，编剧去了。他了解了什么是天才，可能感到了绝望。同样，曾先生的这种天才式写作，在他个人完全是我行我素，但要放在更大的圈子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真正的写作在民间，希

望在民间，那么民间必有一批和曾先生类似的坚守着，他们各自封闭，虽然没有联系，但因为文学信仰，因为完全放开的姿态，他们在精神实质上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成品率最低的写作方式，是需要太多的人飞蛾扑火般投入、埋没、消失……偶有一例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群体的成功。在此我忍不住读一下美国作家帕拉尼克说过的一段话：“电影，或是音乐，或是电视，都必须有某种节制才能播放给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其余的大众传播形式制作成本又太高，不能冒险只提供有限的对象。但是一本书印刷和装订都很便宜，一本书就像性爱一样私密而你情我愿，书本需要花时间和力气去吸收——也给读者各种中途罢手的机会。”“一本书就像性爱一样私密而你情我愿”，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虚度一生》这部作品上很合适，曾庆仁先生能这么写，就必须具有得一知己足矣的心态。而这已经实现了，我觉得，曾庆仁是这部作品的父亲，而潘年英先生对于这本书的理解，几乎等同于它的情人。当然，打这个比喻不扯到辈分。某种程度上，潘年英先生也在极力推广这部作品，我就是因此得以读到，但我确实并不是目标读者。所以，这个工作潘年英先生既然做了，不妨接着做下去，不要想着百年后是否流传，作品的品质和推广的力度，都是不可或缺，应该现在就去。由此想到《白鹿原》，你能在陈忠实面前说些批评意见，但决不能跟这书的责编何启治说不好，他可能跟你拼老命。《白鹿原》正因为有何启治等人的努力呵护和推广，才达到今天的影响力。作品诚高贵，推广可从俗，正因为这部作品的目标读者非常难寻，所以努力推广，也是让最该读到它的读者读到它。

后记：曾庆仁先生长篇小说《虚度一生》还没正式出版之前，2011年3月26日，由潘年英教授发起，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与会代表的发言在网络上发表之后，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虚度一生》这部书稿也因此被做出版的肖祥剑先生看中，并交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该书正式出版后，2013年4月6日，由田茂军教授主持，在吉首大学再次举行了一次作品研讨会。本文系由潘年英根据两次研讨会部分代表的发言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黄声波